

记忆之墟：《同情者》中的不可靠叙述

余婷雨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1月27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10日；发布日期：2026年4月21日

摘要

阮清越的《同情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双面人”的自白式人生，其主体以“检讨书”为基本叙述形态，呈现出高度碎片化与反复修正的记忆书写。文章以不可靠叙述理论为切入点，论述小说中记忆与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认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并非单纯源于道德缺陷或认知失误，而是由其分裂的价值立场与文化身份、受规训的书写机制以及高度封闭的叙述时空共同建构而成。在这一过程中，记忆既是叙述的基础，又不断受到叙述行为的重塑，最终形成一片无法整合的“记忆之墟”。通过区分疏远型与契约型不可靠性，文章进一步指出，《同情者》在制造深层反讽的同时，又悖论式地引发读者的同情与共感，使不可靠叙述成为重构战争记忆的重要文学机制。

关键词

《同情者》，不可靠叙述，记忆，阮清越

Ruins of Memory: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The Sympathizer*

Tingyu S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anuary 27,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1, 2026

Abstract

Viet Thanh Nguyen's *The Sympathizer* is narrated in the first person as a confessional account of a "man of two faces", with the novel's core structured as a series of written confessions produced under surveillance. This narrative framework gives rise to a fragmented and repeatedly revised mode of remembering. Drawing on theorie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narration in the novel. It argues that the narrator's unreliability does not stem simply from moral failure or cognitive error, but is jointly produced by his divided

value system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disciplined form of confessional writing, and a highly enclosed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Within this process, memory functions not only as the foundation of narration but is also continuously reshaped and regulated by the act of narration itself, ultimately forming what may be described as “ruins of memory”.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stranging and bonding unreliability, the article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Sympathizer* generates profound irony while simultaneously eliciting readerly sympathy in a paradoxical manner, thereby position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as a crucial literary mechanism for reconfiguring memories of the War.

Keywords

The Sympathizer, Unreliable Narration, Memory, Viet Thanh Nguye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美国越裔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 1971~)的《同情者》(*The Sympathizer*, 2015)以战争为历史背景,通过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双面人”的故事。叙述者既是法越混血儿,也是战争中的复杂角色。他一方面深谙越南文化,另一方面又熟练掌握美国的叙事逻辑。这种与生俱来的双重性,使他得以潜伏于南越内部,为北越提供战时信息,并最终卷入一场难以自洽的身份危机。小说主体部分以“检讨书”的形式展开,叙述者对自身经历进行反复回溯与自我辩护;结尾五章则回到叙事现实,揭示“无脸”男人的真实身份。

小说出版后随即获得 2016 年普利策奖,并在英语文学和越战书写等领域引发持续讨论。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创伤书写、身份危机、伦理困境和记忆机制等主题。例如,有学者指出,记忆具有伦理性与选择性,主人公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反复协调,最终实现自我身份重构[1]。近年来相关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更具多样性与创新性,突破了传统的主题分析局限。例如,引入量化研究方法,通过主题建模分析小说中的空间分布特征[2];关注不同媒介形态,揭示美国如何借助媒介话语的拟态策略操纵真实[3]。然而,学界对该小说叙事策略本身的分析仍显不足。现有研究或从叙事时间、叙事语式和叙事语态等层面探讨小说的美学效果[4];或从跨文本视角概括其幽灵叙事的象征结构[5]。小说中第一人称“检讨式”叙述何以构成一种高度复杂的不可靠叙述机制,以及这种不可靠性在文本中如何运作、产生何种效应,尚未得到深入探讨。

事实上,《同情者》的叙述从一开始便呈现出明显的不可靠特征。尽管叙述者不断进行坦白式的自我剖析与辩护,但其叙述却频繁显露出自相矛盾、情感过载与价值游移。作者有意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制造距离,甚至通过反讽性话语让叙述者“说反话”,从而使其叙述本身被质疑、拆解,这正是不可靠叙述。正如韦恩·布斯所指出的,当叙述者按照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说话和行动时,是可靠叙述者,反之,则是不可靠叙述者([6], p. 148)。随着认知叙述学的发展,也有学者将判断不可靠性的权威由作者转向读者,使不可靠叙述理论处于动态发展之中([7], p. 17)。在这一理论脉络下,《同情者》尤具研究价值。小说呈现的并非可被如实再现的战争经验,而是在高度制度化的检讨语境中被反复书写的个人记忆。不可靠叙述在小说中不仅是一种制造反讽或误导读者的叙事技巧,更是揭示战争话语生成机制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将从叙述者不可靠的认知机制入手,深入探讨其不可靠叙述的呈现策略和文本效应。

2. “双面人”不可靠的认知机制

记忆首先是一种生理功能，但在文学叙事中，它更是一种深度嵌入主体意识与价值判断的心理活动([8], p. 32)。个体在面对创伤或不利经验时，往往通过遗忘、压缩或重组记忆的方式，使其在叙述中获得某种可被接受的合理性。相反，对于具有情感价值的记忆，则可能通过反复回忆而被不断强化。由此，记忆并非被动储存的过往经验，而是一种始终处于选择与重组的动态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记忆与叙述构成了双向建构关系：一方面，不可靠的记忆为不可靠叙述提供心理与认知基础；另一方面，叙述又反过来对记忆进行筛选和规训，使其逐渐偏离经验本身。

阮清越塑造这样一位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其根本原因并不止于叙事技巧的选择，而在于叙述主体本身即处于高度分裂的认知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亦曾坦言自身记忆的不稳定性，指出“我认为发生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反之亦然”[9]。这一自我反思直接体现在了虚构叙述者的认知结构之中。他是一个双面人，有两套思想的人([10], p. 1)，其记忆不可避免地受到身份冲突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废墟化”特征。记忆并非呈现为稳定、连贯的因果链条，而是由偶发事件和断裂场景构成的碎片集合。这一点与本雅明的废墟美学不谋而合，废墟不仅是一种物理景象，更是一种认识论的姿态。

在立场层面，叙述者明面上是南越军官，暗地里则是向北越持续输送情报的地下工作者。作为前者，他不得不认同并内化南越对美援的依赖逻辑，在情感与行动上与将军及克劳德维持表面忠诚；而作为后者，他又必须时刻以敏的教诲为思想准绳。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叙述者的日常生活与心理活动中持续冲突，使其长期处于自我伪装的状态之中，甚至把撒谎变成了一种不易忘记的技能和习惯([10], p. 235)。在这种情境下，叙述并非简单的经验回溯，而是一种策略化的言说实践。

在文化层面，叙述者的认知裂隙同样显著。他既承载着东方的历史，又不断被迫以西方话语证明自身价值。作为越南女仆与法国神父的私生子，他的存在本身即被视为殖民历史的尴尬遗产。血统上的不完整性，使他始终无法在族群共同体中获得完全承认。与此同时，这种东西融合身份，又使他被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以便日后潜入内部。他在语言与文化层面高度“美国化”，英语流利到被误认为是美国人([10], p. 8)。然而，这种文化适应并未真正转化为身份认同，所谓“自由的土地”始终将他排除在外。

正如以上分析所示，叙述者并非一个认知立场稳定的主体，而是一个由价值立场、文化认同与情感创伤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综合体。在这样的认知结构中，记忆的不稳定性将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叙述之中。基于布斯的理论，詹姆斯·费伦进一步从事实、感知和价值三个维度，细化了不可靠叙述的六种具体类型([11], p. 294)。

首先，在事实轴上，叙述者确实存在错误与不充分的报道。逃离西贡时，叙述者误认为是南越军队在开火泄愤([10], p. 53)。这一判断并非源于感知能力的缺失，而是出于检讨语境下的叙述策略：面对拥有绝对权威的指挥官，叙述者显然不敢将血腥后果完全归咎于北越。此外，叙述者对自身生活的回忆同样呈现出不充分性。他保留了与母亲、邦和敏之间的温情片段，却省略了更为具体、可能引发道德审视的细节。例如，在叙述前期，叙述者声称没有背叛父亲；然而，后续指挥官的不断逼问却暗示出他曾对父亲产生过极端甚至敌对的念头——希望父亲死。这种选择性叙述表明，记忆并非先于叙述存在，而是在叙述过程中被重新排列以适配当前语境。

其次，在感知轴上，叙述者的解读同样存在偏差。叙述机场逃亡时，他讲道：跟女特工一样，跟把守机场入口的中尉一样，他乐得见我死哩([10], p. 53)。对于女特工而言，这一点并不准确。故事早期，由于叙述者的失误，女特工被捕并遭受非人折磨。此后，叙述者长期困于内疚与自责。事实上，女特工的坚韧在文本中反复得到强调，她的忠诚不存在任何动摇空间。叙述者却因自身失误与持续愧疚，将“希望我死”这一情绪强加于她身上，从而在感知层面扭曲了对他者的理解。

最后，在价值轴上，叙述者的道德判断同样经受着严峻考验。当将军首次怀疑有内鬼时，他迅速将矛头引向酒仙少校，以保全自身性命。这一行为在生存逻辑中可被视为理性选择，但其伦理后果却在叙述中不断显现。酒仙少校热情待人，对于叙述者亦无明显偏见，却因其行为而丧命。更为讽刺的是，叙述者获得爆炸事件赔偿金后，试图资助其遗孀和孩子，却遭到拒绝，资金反被用于将军的“光复计划”。这些细节无不使叙述者的自我辩护在道德层面遭到瓦解，也为后文不可靠叙述所产生的复杂效应奠定了基础。

3. 以“受限时空”为核心的叙述策略

除叙述者自身双重身份所造成的认知分裂，《同情者》中高度封闭的叙述时空也进一步从结构层面强化了叙述的不可靠性。前文已经提到，小说主体部分以检讨书为基本叙述形态，而检讨书并非中性的自述文体，而是一种在权力监督下完成的制度化书写。因此，叙述者并不是在自由回忆过去，而是在被要求“想明白、写正确”的前提下，对自身记忆进行反复校正与重组。从这一视角来看，小说中的叙述时空不仅限制了叙述者的行动自由，更深刻介入了其记忆的生成机制。

从叙述时间来看，小说的显性时间跨度并不复杂：自叙述者和邦参与“光复计划”被捕，到最后离开越南，约一年左右。然而，这一看似清晰的时间框架却在叙述中呈现出模糊性与封闭性。被捕后，叙述者迫切希望通过“坦白”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但唯一能够为其作证的人——敏，却始终没有现身。叙述者无法确认检讨的终点，也无法理解为何要不断重复叙述同一段人生。初来时，他简直是一个狂躁的疯子([10], p. 362)。后来，他逐渐被迫接受了这种反复的书写与检讨。由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其叙述不再遵循线性时间逻辑，转而呈现出碎片化、回旋式等特点。

在这一语境下，小说中的时间并非事件自然展开的顺序，而是一种被检讨机制干扰、打断的心理时间。叙述者在回忆中频繁使用倒叙与插叙，将不同历史时刻置于同一叙述层面。例如，叙述拟定撤离名单时，突然插入三年前对女特工的回忆([10], p. 10)。实际上，这一时间跳跃是当前情境触发的记忆闪回：当自己即将逃离，而战友仍被囚禁时，愧疚与不安迫使记忆突破时间秩序，侵入当下叙述。同样，在描述美国生活时，他也多次回溯越南的往事，尤其是关于母亲的记忆。吃到将军夫人做的河粉时，他会突然插叙母亲的厨房，继而引出父亲的冷漠与母子间的相互扶持。由此可见，叙述时间的非线性并非自由联想，而是高压情境下记忆失序的表现。

在叙述空间层面，小说的核心场域几乎完全集中在逼仄的单人牢房——一间没有窗户、红砖搭建的单人牢房([10], p. 355)。尽管这一安排在表面上是对叙述者的“优待”，实际上却是一种更为彻底的空间规训。狭小、黑暗且与外界隔绝的牢房，使叙述者失去了与他人对话、与现实校验记忆的可能性。

这种空间限制对叙述者的心理与记忆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长期孤立加剧了其恐惧、焦虑与自我怀疑，使其在反复检讨中不断否定自身经验；另一方面，单人牢房也被塑造成一个强制反思的空间。叙述者被迫在无休止的独处中回望过去，对自己的双重身份、政治选择及其后果进行反思。正如敏所言，这是他获得自由的“必经之路”。然而，这种反思并非主体自主的伦理反省，而是权力监督下的自我审查，其目的不是理解记忆，而是纠正记忆。因此，单人牢房不仅是囚禁身体的空间，更是记忆被反复重写的场所。权力通过限制身体自由，进而介入叙述与记忆，使叙述者逐渐内化审查视角，对自身记忆进行自我规训。

当反复检讨仍无法满足指挥官的要求时，权力最终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叙述者被带入一个几乎完全剥夺感官的封闭空间，在电击治疗中，他的身体与意识被强行分离。此时，记忆不再以叙事形式呈现，而是退化为混乱、无序的感官碎片：婴儿的尖叫、女特工的尖叫、母亲的尖叫与自身的尖叫交织在一起，形成无法整合的感知洪流。记忆在此不再服务于叙述，而是彻底溃散。在这一极端时刻，叙述者所抵达

的并非某种被纠正的真相，而是一种抽象的认知结果——空。空(Nothing)，可以理解为“没有任何东西”，也可以理解为“虚无、一场空”等表示状态、结果的意思，此处指后者([10], p. 383)。至此，叙述者终于回答了敏的问题，即 *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在高度封闭的叙述时空中，记忆不再承担保存经验的功能，而是被不断拆解，直至失去可供叙述的内容，最终在权力规训中塌缩为一片无可整合的“记忆之墟”。由此可见，《同情者》中的不可靠叙述，并非仅源于叙述者的主观偏差，而是由受限时空与制度化书写共同塑造的结构性结果。

4. 反讽与同情：不可靠叙述的双重效应

费伦在对《洛丽塔》的伦理研究中，将不可靠叙述重新界定为一种发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伦理效应。他据此区分出“疏远型不可靠性”和“契约型不可靠性”。在前者中，叙述者的报道、阐释或判断与作者的读者对相关事实的推断之间形成明显偏差，从而拉大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在后者中，这种偏差却会产生一种悖论式效果，即不可靠性反而促成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靠近([11], p. 294)。在《同情者》中，阮清越正是通过并置这两种不可靠性，构建出一种兼具反讽与同情的复杂叙事伦理。

就疏远型不可靠性而言，其判定标准并不单纯在于说谎，而在于文本持续提供与叙述者判断不相符的事实线索，使读者意识到遵循叙述者的视角就意味着远离隐含作者的视角，进而修正最初的理解。

首先，叙述者对敏及其生存处境的想象，体现出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误判。叙述初期，“我”将敏塑造为人生的启蒙者——理性、坚定。这一形象在其回忆中高度稳定，也容易被读者接受。然而，随着叙事推进，文本不断引入新的事实：西贡事变当日，敏遭到严重烧伤，被迫以面具示人，甚至妻儿也不敢接触他。他主动申请调职，既是出于营救好友的责任，也包含着对自身创伤和家庭关系的逃避。在这一过程中，读者逐渐意识到：叙述者所坚持的“胜利-幸福”的线性想象，并不能解释敏的现实处境。这种解释能力的失效，促使读者回过头来审视叙述者的幼稚与盲目。由此，叙述者从最初的可信回忆者，转变为一个需要被判断的对象，疏远型不可靠性也在这一阅读转向中完成其反讽功能。

其次，类似的机制也体现在叙述者对刺杀桑尼动机的自我阐释中。叙述者一再强调刺杀行为的立场合理性，将其描述为清楚可疑分子的必要行动。然而，叙述细节却不断暴露出其个人情感的介入。叙述者因参与电影《村庄》的制作与女友索菲亚异地，桑尼却趁机插足，彻底终结了他的爱情。这无疑是对叙述者巨大的情感羞辱。并且，刺杀前后，叙述者频繁与拉娜接触的行为，也进一步削弱了其纯粹立场动机的可信度。叙述者试图通过立场话语遮蔽自身的嫉妒、愤怒与自尊受损，但这些被压抑的情绪仍在叙事中显露出来。当读者识破这种自我合理化，就会意识到叙述者在道德判断上的失衡，并拒绝完全认同叙述者的自我辩护。

此外，叙述者对自身性经验的回忆，也体现出极端的疏远型不可靠性。与隐含作者不同，叙述者有时候会犯下一些非道德的行径([12], p. 137)。青春期时，他曾无视神父父亲的告诫，通过引用欧洲宗教史中骇人的例子来弱化自身行为的异常性，但这样反而暴露出其道德认知的扭曲。这不仅未能博得理解，反而加深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伦理距离，使其成为被审视、被批判的对象。

与上述疏远效应不同，契约型不可靠性的判定标准则是叙述者是否主动暴露自身认知的局限，并得到隐含作者的认同，使读者在知晓其不可靠的前提下仍能产生同情与共鸣。

小说开篇，叙述者即坦言：“我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并将自己的才华称为“很危险的东西”([10], p. 1)。这种毫无保留的自我揭露，实际上是费伦所谓的“真诚却被误导的自我贬低”。叙述者因自身双重性而贬低自己，隐含作者却通过叙述语境引导读者将其认知缺陷归咎于精神压力和心理混乱。通过这种坦然而低姿态的承认，叙述者在读者心中建立起一种诚实的形象，使读者在尚未展开全面判断之前，便已在情感上向其靠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诚实并不等于完全透明。叙述者承认自己

会说谎，却并未说明何时、为何、对谁说谎。正是在这种暴露与遮蔽并存的状态中，契约型效应得以生效：读者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但同时又在隐含作者的支持下对其产生同理心。

小说中的幽灵叙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契约效应。幽灵不断侵扰生者的现实生活和记忆，成为表达战争恐惧和心灵痛苦的重要载体([5], p. 30)。“房间天花板上竟现出了桑尼和酒仙少校，他俩像习惯了一直这样呆在上面打发时间，这叫我不得安宁，难以入睡”([10], p. 335)。显然，叙述者的语言在字面上是不可靠的，但从隐喻意义上来讲，却是可靠的。一方面，这些幽灵是叙述者无法摆脱的罪责与创伤的具象化呈现；另一方面，这也是叙述者赎罪的途径之一，体现出其伦理判断上的可靠性。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靠叙述不再是认知障碍，转而成为情感通道。读者并未因叙述失真而疏远叙述者，反而在理解其心理困境的过程中与之建立共情关系。

类似的契约效应也体现在其“失忆”后的叙述中。叙述者“受邀”担任电影的文化顾问，却遭遇恶意的爆炸事故。事后，叙述者声称爆炸导致其部分记忆缺失，却无法明确指出遗忘的内容，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明。从叙事逻辑上看，这一陈述处于无法证伪的灰色地带，构成高度不可靠的自我描述。然而，正是这种无法确认的空白，使失忆成为其创伤经验的隐喻。叙述者并非通过精确回忆来证明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而是通过记忆的缺失来展示暴力对主体的伤害。因此，不可靠叙述再次呈现出其悖论性力量：叙述越是不确定，读者越能共情其潜在的痛苦。

5. 结语

通过不可靠叙述，《同情者》建构起一个充满裂隙与回旋的“记忆之墟”。作为一个具有“双面”性质的主体，叙述者始终无法在价值立场、文化身份与伦理责任之间找到稳定的位置，其记忆也因此呈现出矛盾与反复修正的状态。在“检讨书”这一受权力监督的书写机制中，记忆不再是自发生成的心理活动，而是被反复审查的对象。

本文从叙述主体与叙述时空两个层面出发，论证了不可靠叙述并非单纯源于叙述者的道德缺陷或认知失误，而是与身份分裂、权力话语以及创伤记忆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在高度受限的叙述时空中，记忆被迫以碎片化、非线性的方式显现，既暴露出叙述者的认知困境，也揭示了社会在政治语境中被建构、被规训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同情者》中不可靠叙述所产生的双重伦理效应。一方面，疏远型不可靠性通过制造认知与价值判断的偏差，使读者与叙述者保持必要的批判距离，形成对其幼稚、狭隘与自我合理化倾向的反讽性审视；另一方面，契约型不可靠性又在叙述失真的前提下，引导读者理解其创伤经验与精神困境，从而在不可靠之中产生同情。这种反讽与共感并置的叙事效果，使读者既无法完全认同叙述者，也难以彻底拒绝他，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阅读张力。

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来看，《同情者》的不可靠叙述亦是一种历史反思方式。在其他移民文学中，不可靠叙述同样常被用于呈现身份分裂与自我欺骗，例如《长日将尽》中管家对个人历史的选择性回避，更多服务于个人伦理的反思。而阮清越通过让记忆显露其破碎性与不确定性，质疑了以单一视角、线性叙事为特征的传统叙述模式，为战争经验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矛盾且去中心化的表达空间。小说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是在记忆的废墟之上，呈现个体在战争、权力与伦理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因此，《同情者》所建构的“记忆之墟”，不仅属于叙述者个人，也指向历史事件在文学中的持续回响，使小说成为理解当代美国越裔文学的重要文本。

参考文献

- [1] 高建荣. 《同情者》中的记忆伦理与身份重构[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3): 89-99.
- [2] Ying, S.Y., Keikhosrokiani, P. and Asl, M.P. (2022) Opinion Mining on Viet Thanh Nguyen's *The Sympathizer* Using Topic Modell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14, 163-183.

-
- [3] 康佳怡, 鲍忠明. 《同情者》中媒介话语的拟态策略及反抗书写[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25, 9(3): 145-156.
- [4] 马思源. 热奈特叙事理论视角下《同情者》的叙事策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1.
- [5] 李志峰, 邓诗. 经幽灵所见: 阮清越战争叙事的迂回与进入[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8(8): 30-39+94-95.
- [6] 韦恩·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华明, 胡晓苏, 周宪,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 [7] 王悦. 镣铐中的舞蹈: 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与不可靠叙述[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8] 李莉. 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 [9] Alter, A. (2021) He Writes Unreliable Narrators Because He Is One, Too.
<https://vietnguyen.info/2021/he-writes-unreliable-narrators-because-he-is-one-too>
- [10] 阮清越. 同情者[M]. 陈恒仕,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11] 詹姆斯·费伦, 尚必武. 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型不可靠性及《洛丽塔》的叙事伦理[J]. 世界文学评论, 2008(2): 294-302.
- [12] 曾阳萍, 杜志卿. 论桑塔格《恩主》中的不可靠叙述[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137-145.